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airiti Library

韓國的東協政策：中等強國視角之分析

South Korea's ASEAN Policy: the Middle Power Perspective

doi:10.30402/EAS.201807_49(1).0004

東亞研究, 49(1), 2018

East Asia Studies, 49(1), 2018

作者/Author： 王文岳(James W.Y. Wang)

頁數/Page： 105-14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8/07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402/EAS.201807_49(1).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最完整的學術整合查詢平台—華藝線上圖書館 ● http://www.airitilibrary.com ● Find more academic articles on Airiti Library

airiti

韓國的東協政策：中等強國視角之分析

South Korea's ASEAN Policy: the Middle Power Perspective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王文岳

James W.Y.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iriti

South Korea's ASEAN Policy: the Middle Power Perspective

James W.Y. Wa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National Chi Nan University)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South Korea seeks the "middle power" status through varieties of political announcements, security dialogue,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and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raditionally, the "middle power" concept suggests the state could propose relatively autonomous diplomatic policy and take necessary actions to strengthen its systemic influence and, meanwhile, downplay domination from the hegemony. The middle power's relationship with the hegemony c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harmonic, alienate, and challenging. The middle state has to materialize its diplomatic initiatives through self-conceptualization, diplomatic 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From President Roh Tae-woo "middle power" conception to President Moon Jae-in's New South Policy, South Korea obviously seeks relatively autonomous foreign policy. By exploring the middle power initiatives, diplomatic action, an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motivated and promoted by the South Korea leadership, even without direct support from U.S. and China, I find South Korea successfully establishes the middle power status. Meanwhile, with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ASEAN-South Korea relationship, South Korea also gains influence in Northeast, Southeast, and global politics.

Keywords: South Korea, ASEAN, Middle Power, New South Policy

airiti

韓國的東協政策：中等強國視角之分析

王文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後冷戰時期以來，韓國逐漸各種政治宣示、安全對話、經貿合作，以及自身的組織創新，對於傳統的安全暨政經政策進行了一種可名之為「中等強國」的路線修正。傳統上，中等強國乃基於國家主觀的認知，在適當環境下，提出具體的外交主張並付諸行動，以發揮中等強國在國際體系的影響力，降低強權的宰制。中等強國與霸權國家的關係，可以區分為受到霸權國家的同意、疏遠霸權國家、挑戰霸權國家三種型態。中等強國必須透過自我概念化、外交作為，以及制度性安排來落實其構想。韓國自盧泰愚總統提出中等強國構想，以至於文在寅總統的新南方政策，明確反映出韓國追求相對自主外交路線之作為。本研究檢視後冷戰時期歷任總統中等強國構想、外交作為，以及制度性安排，顯示韓國已經透過中等強國構想的實踐，在缺乏美國與中國大陸支持的情形下，韓國仍然透過與東協關係的自主發展，建立起自身的韓國中等強國的外交路線，並且尋求在東北亞、東南亞，乃至於全球政治上的相對自主地位。

關鍵詞：韓國、東協、中等強國、新南方政策

airiti

壹、導論

近年來，東南亞在國際政治經濟議題的重要性與日俱增。中國大陸宣佈了「一帶一路」倡議，美國川普總統亞洲行宣佈的「印太戰略」（Indo-Pacific Strategy）、日本賡續《跨太平洋戰略夥伴協定》而成的「跨太平洋全面進步夥伴協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簡稱：CPTPP），以及台灣政府宣示的「新南向政策」（New Southbound Policy），均反映了東南亞實質影響力的提升。無庸諱言，前述與東南亞相關的經貿安全協定，仍存在著議程、規模與政策方向的差異：中國大陸的「一帶一路」倡議著重「連結性」（connectivity）的建構，以運輸基礎建設為核定；美國的「印太戰略」在於建構印度至亞太區域的戰略格局，以回應南海至印度洋的安全挑戰；日本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則在填補美國川普政府掌政後的經貿制度空缺；台灣的《新南向政策》則在舖陳自身與東南亞的連結，但這些差異反而突顯了大國面對東南亞已必須審慎發展交往策略的事實。

準此，東南亞的崛起對於韓國而言亦有重要意義。2017年11月，韓國總統文在寅訪問印尼，宣示了「新南方政策」（New Southern Policy），將韓國與東協之間的關係提升至美、日、中、俄等大國對等的高度。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的「東協企業與投資高峰會」（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上，文再寅總統進一步闡述新南方政策的目標，即是在「以人為本」（people-centered）的原則上共創「和平與繁榮」（Peace and Prosperity）的「韓國—東協共同體」（South Korea-ASEAN Community）。韓國新南方政策雖然強調立基於「人民、和平與繁榮」（ People, Peace, and Prosperity）「3P原則」所構成的命運共同體精神，然而文在寅總統先前於2017年9月亦於俄羅斯發表了「新北方政策」，主張加

airiti

強韓國與俄羅斯的遠東地區、中國大陸東三省及蒙古三地之間的經濟合作，將新南方政策與新北方政策共同審視，即明瞭韓國文在寅總統的外交宣示，並非純然地規避區域安全風險，而是延續過往韓國在國際上積極性「外交作為」。由此觀點出發，韓國的新南方政策除了閒認東南亞的經濟發展潛力，同時也在利用既有的《韓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與《東協經濟共同體》，進一步擴大韓國在區域的影響力（陳家齊、朱小明編譯 2009）。

東協近20年來的整合運動成果豐碩，除在整合進程上取得具體成效，完成了「東協經濟共同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之推動；在經濟成長上亦為當今全球衰退浪潮中少數逆勢成長的區域。東協與週邊大國的互動，秉持「東協中心性」（ASEAN Centrality）與「地緣政治」兩項原則：前者是指以東協為成員國外交決策之核心，保障東南亞國家集體議價的權利，此一原則與「東協模式」（The ASEAN Way）成為穩定與維持東協運作的核心規範；後者則是著重東南亞國家與週邊大國因歷史與文化影響所建構的長期性關係，而中國大陸與東南亞國家過往存在的「帝國–邊陲關係」所遺留的歷史文化遺緒，迄今仍是東協成員國安全戰略的核心考量。

東協中心性與地緣政治的思維，如果長期發展，對於大國介入東協政治勢亦將有所影響，這也使週邊大國與東協的互動關係微妙。美國對於東協的區域整合自始即持保留態度。日本在1990年代推動「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簡稱：APEC）之時，美國即表達對於東亞區域整合的疑慮；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Asian Financial Crisis）爆發，美國亦反對日本提出的「亞元」（Asian Dollar）構想，以疏解東南亞國家的金融援助請求。曾幾何時，東協國家不但持續保持成長，區域整合亦獲得具體成果（Ikenberry 2008, 221），反而迫使美國

airiti

於歐巴馬總統任內倡議「環太平洋戰略夥伴協議」（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簡稱：TPP），即使主張美國優先的川普總統亦在當選總統後親訪東南亞國家。顯見東協與週邊強國的關係，亦處於持續演化的動態中。

東亞國家的中等強國討論，並不容易從現行的國際政治研究中取得答案。主要的原因在於分析本體上，仍以區域作為主要分析層次，在反映箇中次級動態的差異並不容易。大體而言，東亞國家的區域互動，約略可歸納為三個模式。首先，在「新功能主義」（neo-functionalism）的典範中，多數研究多數援引歐洲整合的經驗，主張東亞國家亦可能透過區域的國家行為者經由政治領袖的意志，外交人員的努力，以及功能性的合作與協議，由低政治議程進入高政治議程，「由經而政」進入高度制度化的區域整合進程。這類研究相信東亞區域國家彼此的互動存在明確的政治命題，因此東亞區域的建構亦可以透過公私部門的集體協力，循序漸進。亦有更為精緻的研究，認為東南亞由下而上的經濟整合網，在「東協模式」低度制度化的情形下，仍能存有獨特的彈性與調適能力，融入一個強調全球化與國際化的新經濟局勢，此意味著東亞業已發展出一種存在區域特色，能夠與全球政經變局同步（Cossa and Khanna 1997; Dieter 2009; Hatch 2002; Katzenstein 2000; Nesadurai 2009; Ravenhill 2000）。這類討論貼切地描繪了經濟與安全等跨國性現象如何趨動區域政府相互合作，投入區域組織的建構，特別在東亞諸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各國可以在整合壓力與國內需求中取得動態平衡。然而，保持彈性與開放的結果，也使得東亞區域整合速度緩慢，再加上區域國家並不支持透過時間表的制定來強化整合進程，使得東亞區域整合在尊重個別國家參與區域組織之自主性等前提下，對於區域整體競爭力的提升造成明顯的影響。

airiti

第二，「經濟學典範」的東亞整合討論中，多半主張「競爭力」的觀點，認為東亞國家亦需要透過經濟區塊的追求來強化東亞經濟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如同Aggarwal and Koo所描述，冷戰終結、金融危機與恐怖攻擊的「三重震盪」中，東亞經濟區域已認知集體財（collective goods）的重要性，所謂的「三重震盪」實際上代表的是冷戰結束以來「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形塑東亞國家區域認知的時空條件，此一觀點中，強調區域國家面對環境變局所進行的回應（Aggarwal and Koo 2007）。經濟學者的研究，確實指出區域整合除了整體區域環境的關照以外東南亞國家對於環境變化的詮釋以及因應措施。此一理解對於解釋東南亞國家協會於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修正固有的「東協模式」，走向《東協憲章》之路，頗有助益（李佩珊、楊昊 2007）。而且在事實上，後冷戰時期的東南亞多邊結構亦不足以有效因應「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Aggarwal and Koo 2007; Beeson 2011; Grimes 2011; Grimes 2006; Kang 2009; Katada 2011, 278; Maclntyre, Pempel and Ravenhill 2008, 8; Solís and Katada 2007; Woo 2007, 59）。

東南亞國家之後在主權位置上的妥協，與區域合作的強化，奠定了1997年以後東亞區域整合以東協為基礎的路徑，似乎證明了經濟學典範的分析（Solís and Katada 2009）。但近十年的發展，似乎又曝露經濟學典範的弱點。一方面，在新興東南亞國家（主要來自大陸東南亞的越南、柬埔寨、寮國與緬甸）加入東協以後，東南亞區域互動益形複雜，內部的溝通之重要性並不低於回應外部挑戰；另一方面，中國大陸、日本與美國在東南亞的合縱連橫對於東南亞政經發展影響甚大，近十年的雙邊主義之影響並不下於多邊主義，唯有回歸至東南亞區域國家的互動，肯認個別國家對於東亞區域因其位置與思維不同而出現的發展議程差異，才能真實瞭解東南

airiti

亞區域國家對於區域整合的參與瞭解與參與。

最後，「全球化典範」主張東南亞區域整合的分析應超越政治面與經濟面的分析，並且透過全球層次的整合視角，分析東南亞國家政治經濟的互動。長期研究東亞區域主義的Ravenhill即認為東亞區域近年來的「優惠性貿易協定」（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的談判對象多為跨區域國家，同時，其簽署內容往往屬於整合程度更高的「世界貿易組織加值條款」（WTO Plus provision），涵蓋WTO尚未達成多邊協定的議題，包括投資、競爭政策、政府採購、環境保護與相互認證及電子商務等「貿易便捷化」領域（Ravenhill 2009, 231）。同樣的，Jones and Smith （2007, 172）的研究也指出東亞區域組織的政治修辭與官方文獻呈現一個虛構的區域社群圖像，東亞區域國家在全球化的趨勢下，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全球層次的接軌來提升國家競爭力。全球化觀點對於我們瞭解東南亞國家的互動自有超越單一典範之貢獻，事實上，在多層次的政治經濟互動場域中，東亞區域國家對於東亞整合之企圖心與全球市場的參與存在一種兼融多邊主義、區域主義與雙邊主義的多軌區域策略（Gilson 2004）。最明顯的國家即為韓國，近年來韓國除了積極拓展雙邊關係外，也與歐洲發展跨區域合作，以擴大韓國經貿競爭力。

據此，東南亞區域的互動，以及與週邊國家的關係，過往的研究在本體論上多以「區域」作為關懷，將「國家」視為國際關係體系中的「能動者」（agent），淡化了「國家」作為一個行動者在東南亞國際關係中的核心角色。此一關點顯然忽略了東亞國際政治的複雜性，在更為精緻的研究中，個別國家透過自身的作為，對於東亞政治已經形成長遠的影響（楊昊 2010）。同樣地，韓國與東協自從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後，雙邊關係進展迅速。這個被韓國媒體譽為「最佳FTA」的協定並沒有止於表面的條文，在之後的10

airiti

年，韓國與東協雙方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交流得到了實質提升，加上中國大陸近年的「限韓令」反映中國大陸市場的不穩定性，韓國全面向東協投資避險，三星與LG等全球企業 已將東協視為其價值鍊的核心之一。據此，本文嘗試由「中等強國」的角度，描述韓國近20年企圖於東亞地區形塑自身國家認同的想望，韓國如何透過中等強國的「自我認同」，轉化為韓國外交決策之作為，並且落實為制度安排，形成了韓國在東協互動而建構的外交規範。

貳、中等強國：相關文獻、概念與韓國的外交作為

韓國近20年來積極追求FTA的締結，建構全球經貿網路，主辦重大賽事，在「二十國集團」（G-20）中與墨西哥、印尼、土耳其、澳洲共組諮詢團體，自號為一群共享民主與市場經濟的「中等強國」（Middle Power Nations），此等外交作為，均在強化同儕國家在國際政治上影響力。中等強國並非全新的國際政治概念，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加拿大即自許為中等強國，並且強調中等強國在聯合國體系可以扮演的特殊角色（Glazebrook 1947）；在冷戰時期，兩極體系當道，中等強國論述影響降低；冷戰終結以後，中等強國的主張再度抬頭。加拿大與澳洲的比較研究中，Cooper, Higgot, and Nossal (1993)即強調中等強國應在適當環境下，提出具體的外交主張並付諸行動，以發揮中等強國在國際體系的影響力。即使當今時空脈絡不同以往，但當今國際關係體系中，中等強國企圖擺脫強權宰制，強化自身在國際關係體系發言權的企圖未曾稍減。除了印度、日本、加拿大、澳洲等傳統認定的中等強國以外，韓國、墨西亞、印尼、土耳其等新興中等強國亦在後冷戰區域政治體系中一再強調自身安全利益之重要性，以擴大國際影響力（Shin 2015, 188）。

airiti

中等強國的發展之所以受到限制的主因，乃在於缺乏明確的定義。再加上國際關係理論傾向於以強權作為研究核心，亦使得中等強國缺乏足夠關注；冷戰結束以後，兩極體制的崩解，強化了中等強國在知識上的重要性。中等強國不如大國具有影響國際關係體系的職能與資源，Cooper、Higgot與Nossal（1993, 24）主張中等強國往往必須廣結善緣，多方考量，能屈能伸，並且在現實的條件下，足以發揮其影響力。由今日的角度而言，Cooper、Higgot與Nossal（1993）所提出的主張，充分反映了中等強國除了客觀上的政治與經濟資源以外，其立論基礎必須超越傳統中等強國理論奠基於加拿大與澳大利亞兩大案例之限制，更折衷地著重中等強國之「主觀作為」，方能強化中等強國模式的理論價值與實務參照。

大體而言，綜合Choi（2009, 55）的觀察，中等強國外交作為上可以歸類為三種模式。第一種是在霸權國家的同意下積極追求外交政策，明顯的例子乃是加拿大與澳洲，在美國的支持下，在世界貿易組織與亞洲經合會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種模式則是在疏遠霸權的情形下，追求國家認同的自主性，代表性的例子是丹麥、挪威與瑞典，然而，在聯合國維和行動的改革上，因為中等強國之立場與美國差異較大，因此限縮了丹麥、挪威與瑞典的外交努力。第三則是挑戰霸權的中強國家，典型的例子是巴西、印度與南非，這些中等強國公然挑戰美國的領導權，強調區域整合以弱化美國作為霸權對區域議題上的宰制。

根據前述「中等強國」之分析，中等強國在概念上，需要三大因素的存在：第一、基於客觀環境而提出的「自我概念化」（self-conceptualization）：「中等強國」乃是國家行為者的主觀想望，而此一想望，多數改建立在一定的「利基」（niche）之上。主因在於全球區域整合的發展下，各國的地理空間面臨尺度重建。而因為行政疆域統合與各種經貿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制度環境，創

airiti

造了中等強國得以作為的主觀詮釋（Coenen and Asheim 2006, 88; Cooke 2006, 6; MacLeod 2001, 807）。事實上，在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迅速發展下，超國家組織急速擴展功能領域，國家主權出現雙趨流動，跨國地理空間亦出現重組（Jones and Smith 2007, 172）。在這種情形下，「新區域主義」（new regionalism）、「區域」（region）、「地市–地區」（city-region）、「次國家地區」（sub-state region）、「跨邊界地區」（cross-border region）等概念造成了國際空間之重構，而在這一過程中，除了經濟的交流互動以外，觀念、概念化、價值、認同等社會層面之互動，允宜進一步納入考量（Billiet, Maddens, and Frognier 2006, 916; Bollens 2008, 193; Le Galès 2002, 16; Paquin 2002, 58）。此一觀點意味著「區域」乃一跨領域之觀念，作為中等強國身處之國際環境，其如何被認知並且在一定時間框架中與區域成員國的持續互動所形成的認同，最終成為中等強國對於客觀環境思考而生之「自我概念」。

第二、根據所處的國際社會脈絡，實際落實的「外交作為」。Acharya曾主張一國之外交作為之變化，必須經過「規範在地化」（norm localization）的過程，以使新價值觀為本地社群所接受（Acharya 2004, 251; Acharya 1997, 325）。依此一理論，「中等強國」作為一項國際規範，長期以來亦在觀念的使用上因脈絡的不同，而使決策精英、政策執行者、利益相關者需要特殊時空之安排而成為政策網路之一部（吳玲君 2012, 145；吳玲君 2007, 128；宋興洲 2005, 28；蕭全政 2001, 215）。事實上，冷戰以來，全球各區域國家因為區域組織脈絡的政經差異而生的各式區域主張之發想、政府間的功能性合作與政治精英的協調，逐漸透過制度性厚度的強化建立互信，最終超越政治的對立與社會的分歧，形塑新的規範（Katzenstein 1978; 1985; 2003; Schmitter 1981）。東南亞地區尊重國家主權以「非干預主義」（non-interventionism）與「共

airiti

識決」為基礎的「東協模式」，同時出現「後發型區域主義」與「多元區域主義」並存的形勢亦屬於此一過程（Schmiegelow and Schmiegelow 2007, 12）。透過東南亞國家與週邊國家的互動，建構多元並存的東南亞國際規範（Hemmer and Katzenstein 2002, 578）。

第三、中等強國與週遭環境之互動所建構之「制度性安排」（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經由長期的互動，使東南亞國際規範的接受轉為外交政策之主導原則。區域國家參與區域整合之策略，除了需要考量全球乃至於區域之需求以外，亦需整合國內共識（Rhyu 2011, 76）。特別是東南亞國家區域政策的修正往往出現於重大經濟或安全局勢出現改變之時，冷戰結束、亞洲金融危機等關鍵時刻均成為東南亞國家修正既有規範的重要原因（Calder 2008, 150; Lake 2009）。在重大變局下，均使各國政治精英在單純的經濟層面以外，必須重新思考東南亞秩序變動的意含，乃可能以東南亞自身之制度環境建構相應之可行路線（Caporaso and Tarrow 2009），之後進一步在政治存活的前提下提升政治與社會整合（Capling and Nossal 2009, 153; Helleiner and Pagliari 2011）。此一漸進式的區域整合路線（吳玲君 2012, 142），其主要的目的乃在透過區域國家之間的互動重構對外經貿參與的社會認同 （Paasi 2009）。

韓國的外交政策規範上，具有兩大傳統：第一，重商主義，韓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即透過發展型國家的模式，由國家強力介入經濟的發展 （Haggard, Lim and Kim 2003）。其主要的原因，除了在於冷戰局勢下，需要透過強大的經濟實力來支持安全上的需求，也在於經濟條件落後下，需要透過特殊的制度性安排，以加速經濟的成長（Chang 1994）。在此一情境下，韓國透過國家政

airiti

策工具，強化產業的發展，乃成為經貿政策的重要基礎。第二，事大主義：在韓國歷史上，其國家安全一向受到週邊列強的影響，如何在列強之間求取國家的生存，向來是韓國政治精英日夜思考的核心問題（Calder 2008; Calder and Ye 2010）。據此，韓國外交政策建構過程中，依附強權來取得安全上的穩定，乃成為主要的政策規範。在冷戰時期，韓國即以美國作為安全與經貿上的主要依恃，而此一情形在中國大陸崛起之後，也積極建構與中國大陸的特殊關係。值得注意的是，韓國自冷戰以來，一直以美國為主要的出口貿易市場，即使冷戰結束以後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韓國對於拓展其他出口市場，仍然持保留態度。一直到了亞洲金融風暴以後，韓國才開始大幅修正區域主義路線，並經由持續的論述框架修正，塑造韓國經貿新規範。在一個經貿規範如此保守的國家，於今已成為世界上最積極參與區域建構的國家之一，其中的轉折頗有值得研究之處，以下就規範在地化的角度來分析韓國的區域政策之發展。

民主化以後，韓國開始了其「中等強國」的建構之路，歷任總統一再提出不同的經貿議程，顯示作為經貿強國的「自我概念」與「外交作為」。盧泰愚總統的「國際化」、金泳三總統的「世界化」、一直到金大中總統的「東亞社群構想」，均可以看得出來韓國對於「中等強國」之追求方向。韓國與東協的互動，乃是在後亞洲金融危機開始升高（Ravenhill 2009, 232）。由此一角度而言，韓國與東協互動關係之改變，正好是透過自我概念化所進行的外交作為，最後再經由「規範在地化」進程中所導致的制度改變而確認彼此關係（Acharya 2004, 244）。最後，「中等強國」作為新規範，透過韓國積極地倡議與傳播，逐漸成為國際接受的實存現象（Deutsch 1953, 42）。

airiti

參、後冷戰初期韓國與東協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歐洲與亞洲扶植德國與日本作為歐亞區域秩序重建之基石（Katzenstein 2005）。在東亞地區，《舊金山和約》是東亞安全架構之基礎，在美國為中心構成輻輳式（hub-and-spoke）的安全網路，受到美國核安全傘保護。作為西方安全陣線的前哨，韓國一方面透過與日本的合作取得技術，一方面藉由「關稅暨貿易總協」（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簡稱：GATT）的「普遍化優惠關稅制度」（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取得美國市場的近取權，在戰後美國快速的成長與韓國自身經濟政策成功的情形下，韓國逐漸建立起以出口貿易為導向的自主發展路線（Kang 2002, 185; Kang 2002）。在戰後近40年的時間中，韓國建立了垂直工業體系，主要大財閥也成功由紡織部門跨足鋼鐵、造船、建設、汽車，最近升級進入半導體與航太產業，建立全面與跨足高科技產業的財閥（Rhyu and Lee 2006, 204; Chang 1994）。

1980年代全球政經局勢開始出現轉變，一方面，中國大陸推動改革開放，實施經濟改革，中韓關係出現轉變，韓國財閥嘗試前往中國大陸投資；另一方面，美國不願持續承擔亞洲盟友經濟成長的責任，在外債攀升與美蘇關係趨緩的情形下，美國亞太政策不再將區域安全視為唯一目標。「美國貿易代表署」（Office of the U.S. Trade Representative，以下簡稱：USTR）自1980年代中期以後持續要求台日韓等東亞盟國開放市場，改善鉅額對美貿易逆差（Aggarwal, Koo and Lee 2009, 252）。美國修正亞太政策迫使韓國國內出現調整對外經貿政策之看法，但在政治考量下，韓國經貿官員與政治精英只得被動配合美國之請求，修正對外經貿政策。

1980年代末期，東亞經貿結構出現改變，美洲與歐盟的區域整合急速推進，使得東亞國家體認到加速經濟區塊建構之必要。

airiti

據此，在日本與澳洲的主導下，1989年「亞太經合會」正式成立（Ashizawa 2004）。再加上關稅暨貿總協在貿易自由化的推進上不如人意，「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WTO）的發展迫在眉睫。韓國面對經貿秩序的變局，亦有修正經貿政策與發展自主東亞區域政策之需求。但在長期依賴美韓安保架構與考慮美國觀點的前提下，韓國的政治精英對於東亞區域之參與抱持保留態度。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迪倡議的「東亞經濟集團」（East Asian. Economic Grouping，簡稱：EAEG）被視為意在排除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的主張，而日本倡議的亞太經合會亦被韓國理解為建構「日元圈」的企圖，因此韓國在後冷戰初期，缺乏建立自身東亞認同的動機。

民主化以後，盧泰愚總統任內開始推動「北方政策」，主要著眼點即在改善韓國與朝鮮及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1989年3月，盧泰愚向北京派出「大韓貿易振興公社」代表團，就互設具有領事職能的貿易辦事處進行協商。1991年，聯合國同時接受朝鮮與韓國成為會員國，此後，韓國在盧泰愚總統任內積極推動與各國關係的正常化，並且在1992年成功與中國大陸建交。盧泰愚內任的北方政策並未真正成功地達到韓國促進區域合作之目的，1993-1994的北韓核武危機也使韓國仍需仰賴美韓雙邊安全同盟。此同時，關稅暨貿易總協在烏拉圭回合以後成功地確認世貿組織之建立，這也使得韓國在冷戰後仍然維持對於多邊貿易制度之支持。一直到了1990年代初，韓國與日本、中國大陸一樣，仍是少數未簽署任何優惠性貿易協議之世貿組織會員國（Aggarwal and Koo 2007）。

相對於安全政策，韓國在經貿關係的建立亦乏明顯建樹。隨著歐盟與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成功發展，貿易轉移效應使得韓國逐漸感到邊緣化的威脅，對於亞太經合會的多邊架構，韓國表現出較為支持的態度。1991年韓國於首爾主辦亞太經合會年會，韓

airiti

國也將亞太經合會視為重建亞太區域關係的第一步。然而，亞太經合會內部的會員政治，亦使韓國對於深化區域參與抱持保留態度。1993年的「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要求已開發會員須在2010年達成貿易與投資自由開放的目標，開發中會員則於2020年完成此一目標。此一深具雄心的目標，並不符當時韓國偏好的漸進途徑。1997年的溫哥華高峰會上，美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積極推動「早期自願性部門別自由化」（Early Voluntary Sectoral Liberalization，簡稱：EVSL），希望能在亞太經合會落實特定部門自由化的快速軌道；韓國、日本與東協國家均強烈反對此一計畫，反而支持透過非正式與共識途徑來推動區域整合的東亞國家（Krauss 2003, 318）；韓國此時的東亞區域立場已與支持正式與制度化途徑的美澳紐等國出現重大歧見。自此之後，韓國的東亞區域政策建構上，逐漸降低亞太經合會的重要性，並且強化對於東亞國家內部秩序建立的支持。

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是韓國決意更動東亞區域政策的轉捩點，作為深受亞洲金融危機衝擊的國家，韓國政府首次深刻理解到長期倚賴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在後冷戰時期的脈絡下重新評估。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在金融危機中的作為，無視韓國國內的政經限制，過於嚴苛的結構改革，立即性的導致大量銀行破產、企業倒閉與勞工失業，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甚至可能危及韓國政治（Dore 1998, 778; Haggard, Lim, and Kim 2003, 25）。此外，美國在亞太經合會中反對「亞洲貨幣基金」、「亞元」等相關金融救援措施，亦使韓國政治精英深刻理解到美國、國際貨幣基金與亞洲國家存在立場上的差異。部分韓國國內政治精英亦同意亞洲國家主張國際貨幣基金已經成為「美國財政部–華爾街」利益集團代言人的批評（Wade and Veneroso 1998）。在這種情境下，韓國與其他東亞國家首次在強化東亞區域經濟合作上有了一致的共識，主政的金大

airiti

中總統，也決定更動韓國傳統的多邊主義政策，轉為強化區域雙邊貿易政策的推動。

肆、「中等強國」與外交作為：自我概念化與韓國—東協關係推進

一、 始動：後冷戰時期韓國中等強國的思考起點

韓國「中等強國」構想的提出，最早可以溯源自1991年盧泰愚訪問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時所發表的演說，他主張韓國在1988年首爾奧運之後，在民主轉型與市場經濟兩大價值觀之下，民主韓國的發展將逐漸翻轉朝鮮半島現存狀態，韓國將建立諮詢性會議強化自身在國際上之作為，以致力推動朝鮮半島的和平（Shin 2015, 195）。在此之後，韓國中等強國的構想並沒有更積極的推進，即使在1996年與東南亞國家簽署了「亞洲太平洋會議」（Asia Pacific Council，簡稱：ASPAC），這個韓國首次提出與東南亞相關的的外交倡議，旨在和平解決冷戰時期的安全議題，限於韓國的安全影響力，亞洲太平洋會議之實質作用有限。盧泰愚總統主張韓國將會成為一個「平衡者」（balancer），韓國之作為不僅只於朝鮮半島，韓國將追求更為自主的外交態勢，在國際安全局勢上有所作為。盧泰愚之後的金泳三總統，亦曾提出「世界化」倡議，開啟了韓國作為中等強國經貿實質作為之決策體制。盧泰愚與金泳三兩任總統內任的中等強國倡議被視為外交辭令，並且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後，更證實了韓國中等強國的自我概念化，仍然停留在構想階段，尚未真正提出對應政策促成韓國國內政經安排與國際之接軌，更說不上是落實為制度安排；但金泳三執政時期提出的構想，開啟了韓國政府的中等強國外交方針，是值得注意之處。

airiti

韓國傳統的外交政策以美國馬首是瞻，加上駐韓美軍在安全上的影響，後冷戰初期對於強化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並未被視為優先選項。即使之後外交政策轉向，美韓關係仍是韓國對外關係的優先項目，在修補與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的關係以後，亦需與美國簽署韓美自由貿易協定以強化雙邊關係，可見對美關係的重要性。

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以後，東亞各國貨幣遭到狙擊，韓國與東南多國貨幣大幅貶值，不但造成資金外流、投資停滯，更直接打擊各國生產活動之運作，然而，此一關鍵時刻亦迫使韓國反省過往過於親美的態度之不足，最終促成韓國東亞區域政策的轉向。同年12月，東協加三會員國領域群集吉隆坡，研議東亞國家金融危機的因應之道。翌年，東協領袖會議再次舉行，此次會議中，韓國總統金大中將亞太金融危機視為韓國經濟結構重整之契機，一方面，透過東亞區域整合，韓國可以扭轉過往對於美國貿易之依賴，重新尋求韓國國際的經濟定位；另一方面，透過市場之開放，韓國可以積極引進公司治理、金融監理、外債市場等機制強化韓國政府職能，同時也強化韓國經貿體質 （Chang 2000; Woo-Cumings 1999, 126）。在此原則下，韓國此時對於東亞區域整合構想即在「深化東亞區域參與」與「強化金融合作」兩項原則下進行發展（Lee and Moon 2009, 44）。就深化東亞區域參與方面，韓國主張東亞國家在金融危機的衝擊下，可以透過區域經濟運作的穩定創造共同利益；此同時，東亞國家應建立足以與歐盟或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匹敵的經濟區塊，並且利用東協加三的場合，強化中日韓三國首長互動。

至於在強化金融合作方面，金大中總統在1999年的東協加三高峰會倡議「東亞展望小組」（East Asia Vision Group）與「東亞研究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東亞展望小組主張區域金融監理與管制上，必須建立東亞區域短期資金流動與早期預警機制，此同時，也支持「東亞貨幣基金」（East Asia Monetary

airiti

Fund）之建立，以協調東亞區域匯率。即使東亞貨幣基金的概念並未成功，但在2000年的東協加三財政部長會議中，通過了「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透過一系列的亞洲中央銀行雙邊換匯協議來強化各國貨幣在國際外匯市場的保護（Chwieroth 2007, 452）。清邁倡議的通過，亦使「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與「共同貨幣籃子」（Common Currency Baskets）的討論益形增加（Ikenberry 2008）。

金大中總統任內開始推動的東南亞區域轉向，可以看出韓國在中等強國作為外交倡議上，必須考量國際社會脈絡與自身國內的政治壓力而進行回應。韓國政府在傳統上依持發展型國家的傳統，由政府透過產業政策與行政指導，由銀行為財閥發展提供充裕的資金（Haggard, Lim, and Kim 2003; Hong 1997）。在199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措施中，韓國各種金融機構大肆成立，造成市場信用浮濫，在缺乏適當的金融監理與公司治理的情形下，各財閥無限制的借貸造成大量壞帳，一旦遭到國際金融投機客的狙擊，韓國金融市場立即遭逢巨大風險（Kang 2002）。 據此，金大中政府在倡議區域主義規範上，並不強調東亞區域整合必須挑戰過往以美國為主的出口貿易架構可能產生的風險，以及必然出現的東亞區域貿易轉移現象，相對地，金大中政府強調東亞區域整合可能帶來的市場機會，以及強化政府改革國內經濟之能力，強化了執政之正當性。透過規範框架的過程，金大中政府獲得機會改革沈苛以久的政商關係，並且在國民對於經濟改革的強烈支持下，得以透過開放韓國國內市場的方式改變韓國經濟的體質，奠定日後韓國再起的契機。

二、 盧武鉉時期的新區域政策

金大中總統開啟了韓國「中等強國」思考的自我概念化，繼任的盧武鉉總統則是進一步落實為政策作為，並且鋪陳制度化的基

airiti

礎，是韓國中等強國外交作為的奠基時期。整體而言，韓國在東亞區域整合的推動上，由謹慎轉向積極主動。在盧武鉉總統任內，進一步透過制度創建的方式嫁接既有規範，使得韓國政府得以順利推動區域經貿政策。首先，在金大中政府任內，韓國政府亦在政府組織上仿效「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的設置，在外交通商部之下建立了部長級的「通商交涉本部」（Office of the Minister for Trade，簡稱：OMT），專責政府多邊官僚事務協調與對外貿易談判。通商交涉本部主司自由貿易協定業務，除了設立「FTA交涉代表」以外，尚有FTA政策局及FTA交涉局，專責多軌式FTA政策的推動。另外，為了強化國民對於FTA的認識，後來增設了「FTA國內對策委員會」，以利政府推動符合民意之FTA，以研究有利國民福利之FTA，並化解國內對於FTA的反對勢力。

通商交涉本部的建立，是韓國國家透過政經實力的外交積極作為，強化韓國作為中等強國的重要象徵（Hall and Soskice 2001; Panitch and Konings 2009）。其體現，在於透過政策工具，更積極地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以強化韓國經濟競爭力。在金大中政府任期，韓國政府仍以影響較為有限的國家作為簽約對象。以1998年韓國第一次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的智利為例，為了避免對於國內市場造成重大衝擊，挑戰韓國既有的規範體系，金大中政府將智利作為未來推動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參考案例，韓國政府特別成立了跨部會貿易政策協調委員會，並且成立特別工作團隊，內含市場進入、貿易規則、服務業、智慧財產權與法律程序等5個小組，並且同時與美國、日本、紐西蘭及泰國研議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的可行性，以求韓國–智利自由貿易協定的洽簽模式可以應用到其他雙邊自由貿易協定（Park and Koo 2007, 272）。然而，一直到盧武鉉總統上台，韓國政府才得以充分將自由貿易協定簽署模式落實為韓國的外交政策。

airiti

自2003年就任總統以後，盧武鉉即同時在安全與經濟領域同時推動區域主義。在區域安全上，盧武鉉政府一開始提出「東北亞合作倡議」（Northeast Asian Cooperation Initiative），以求在任內將韓國建設為東北亞的政經樞鈕。在盧武鉉的區域構想中，東北亞的區域整合是區域國家回應全球化進程的最佳途徑，而韓國則可扮演橋樑角色，消弭中日之間的政經歧見，加速東北亞的整合進程。東北亞合作倡議與後冷戰初期的韓國外交政策思唯頗為不同，其主要動議在於推動以東北亞區域為基礎的多邊架構，除了藉由六方會議的機會倡導一個長期性的多邊安全體制的建構，同時也利用東協加三的場合，提議將中日韓高峰會與東北亞國防部長會議予以常規化。東北亞合作倡議對於缺乏互信基礎的相關國家顯得過於冒進。其雙邊與多邊軍事合作與信心建立機制的主張亦不受支持，此一倡議隨著六方會談的失敗而前景看淡。

相對地，具有前一時期發展基礎的區域主義發展，推動較為順遂。盧武鉉總統除了繼承金大中總統推展東亞區域主義之構想，他更進一步建立了「自由貿易協定策略路線圖」（FTA Roadmap）與「締結自由貿易協定程序規程」（Presidential Directive on Procedures for the Conclusion of Free Trade Agreement），使韓國政府推動FTA之職能大幅提升：一方面，韓國政府將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對象區分為3個群組：第一、近程自由貿易協定夥伴，包括智利、新加坡、「歐洲自由貿易聯盟」（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與日本；第二、中程自由貿易協定夥伴：包括墨西哥、加拿大、東協與中國大陸；第三、長程自由貿易協定夥伴：包括美國、歐盟與印度。此同時，韓國政府持續擴編通商交涉本部之編制，使韓國政府具有強大的職能，領導韓國經濟發展（Rhyu 2011）。自通商交涉本部成立後，韓國在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上由

airiti

被動轉向主動，2006年的韓美自由貿易談判成功，是韓國自由貿易政策積極作為的最顯著證明（Robertson 2012, 468）。

伍、中等強國作為制度安排：金融海嘯後韓國與東協之互動與多軌跨區域經貿政策

韓國的「中等強國」經由早期的自我概念化到外到作為，透過區域主義的政策追求，中等強國已逐漸成為韓國的外交政策規範，而此一規範的建立，使韓國政府利用區域主義的參與，積極推動國內經濟轉型，同時也強化政府職能，使得韓國國家在全球化的挑戰下，反而因為成功的制度改革，使得韓國政府建立了Linda Weiss所強調的國家「轉型」能力，透過創建新制度來協助韓國經濟面對全球化的挑戰（Weiss 2003, 302; Weiss 1998, 86）。

當區域主義的追求已經廣為韓國主流社會所接受，韓國政府進一步企圖透過政治精英的共識、區域主義相關政策、政府組織的調整制度化中等強國構想，而此一制度化最明顯的象徵，即是韓國超越亞洲國家的認同限制，在跨「跨區域主義」（trans-regionalism）的議程推動上，奠定其全球政治場域的中等強國形象。據此，「韓美自由貿易協定」（Korea-U.S. FTA）與「韓歐自由貿易協定」（EU-Korea FTA）乃至於晚近的新南方政策之宣示，再再顯示韓國中等強國的追求（Cherry 2012, 253; Rhyu 2011, 78）。

韓國中等強國構想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後遭到頓挫，韓國淪為世界貨幣組織的借貸國，為了償還債務，韓國必須接受嚴苛的改革要求以維繫資金來源；在此一殘酷挑戰下，盧武鉉總統時期開啟了新政府內部自由貿易相關組織的建立。韓國國內政治的進步與革新陣營對抗，對於韓國面對國際化幣基金與WTO所代表的全球化進

airiti

程原本存在激烈爭辯，隨著盧武鉉總統的倡議，此爭議暫時降低。健全信用市場的金融監理與強化財閥企業問責體制的公司治理，已成為改變韓國經濟體質的關鍵政策（Haggard, Lim, and Kim 2003; Wade and Veneroso 1998）。經歷數年的發展，韓國金融市場累積大量的債務處理經驗，而為人垢病的財閥更在強化核心業務的情形下，成為全球企業。韓國國內經濟結構的改革與轉型，使得韓國各界均成為自由貿易體制的忠實支持者。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subprime mortgage crisis）對於韓國可能造成的衝擊被分散投資與自由貿易協定的佈建所削弱，韓國成功安渡金融海嘯，具有更高的自信立足國際社會。

2008年，出身企業界的李明博當選總統以後，透過推動自由貿易協定策略路線圖的中長程目標，將中等強國構想制度化為韓國的外交制度規範。依李明博總統的宣示，在中程目標上，韓國積極透過東北亞商務中心與金融中心的建設，成為東亞區域整合推動者。而在長程目標則是以美國、歐洲自由貿易協定的推動，建立與跨洲主要貿易夥伴的連結，舖設韓國企業於全球崛起最重要的制度基礎。此意謂著李明博政府所推動的中長程目標之目的，乃在於既有的基礎上，連結歐美高度制度化的市場，以進一步提升韓國經貿環境在全球的地位，更使韓國成為東亞連結歐洲與美洲市場的樞鈕（廖舜右 2011）。

在既有的東亞區域參與上，韓國在李明博在2009年3月出訪印尼、澳大利亞與紐西蘭時，提出「新亞洲倡議」（New Asia Initiative）的構想，將韓國的東亞區域外交範圍擴大到南太平洋。此一政策乃將亞洲置於韓國全球夥伴策略的核心，除了旨在強化亞洲各國的經濟互動，並希望強化東亞各國在能源安全、人類安全、跨國議題、自由貿易等領域之合作，以使亞洲國家能跨越冷戰，為即將來臨的「亞洲年代」（Era of Asia）做好準備。同年6月，韓國

airiti

與第三大貿易夥伴東協於濟洲島舉行「東協–韓國20週年紀念高峰會」（ASEAN-Korea 2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Summit），慶祝雙邊自2004年以來相互投資增加5倍與長期關係，其中，雙邊除了同意建立「東協–韓國中心」（ASEAN-Korea Center）以強化雙邊互動的窗口（Cho 2009）。至於在東北亞方面，李明博任內將韓國建設為東北亞商務中心與區域金融樞鈕列為工作重點。此同時，韓國亦企圖成為東北亞整合的樞鈕。2012年11月，韓國利用金邊舉行的東協高峰會，與中國大陸總理溫家寶及日本首相野田佳彥進行會談，促使中日韓三邊同意共同經貿條約的協商 （Sekiguchi 2012）。一旦完成中國大陸–韓國自由貿易協定與日本–韓國自由貿易協定，韓國勢必成為東北亞區域整合樞鈕。

至於在跨洲區域經貿網路的推動上，李明博則企圖透過跨區域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來建構「全球FTA網路」。而對美與對區兩大貿易區塊的自由貿易協定，則是全球FTA網路建構能否成功的關鍵。2007年，韓國與美國簽訂「韓美自由貿易協定」，而李明博上任總統以後，重啟韓美雙方談判，同時也擴大國內產業部門的支持。韓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協商過程反對聲浪不斷，顯示在規範普及化的過程中，仍需克服韓國國內的農業保護主義元素，最後李明博政府仍然採取強硬策略，強行通過韓美自由貿易協定（Ramstad and Lee 2011）。至於韓國與歐盟的談判亦始於2007年，最後在克服國內汽車部門的反對，成功地在2011年完成雙方協議（劉德海 2011）。 整體而言，秉持重商主義傳統的韓國經貿政策在擴大與美歐經濟區塊的接軌以後，已經為韓國企業在全球場域的競爭創造有利的制度性安排，建立了一個複雜的全球自由貿易網路，強化韓國政府的對外職能以外，也讓韓國政府得以帶領國內經濟轉型。然而，由於此一制度性安排傷害勞工階級利益，帶來了所得落差擴大與國內民怨四起的政治代價，成了繼任的朴槿惠政府的重要課題。

airiti

朴槿惠總統代表新國家黨贏得2012年的總統大選，成為韓國第一位女性總統。[1]然而，她豐富的政治經歷，使她在2013年2月就任以來，立即展現她的外交路線，企圖在金大中以來的陽光政策與李明博的親美政策中，走出屬於她自己的第三條路線（李明 2013）。 在第一年的內期中，朴槿惠積極於5月大規模出訪美國、6月分則訪問中國大陸、參與20大工業國高峰會、9月訪問俄羅斯、同時也參與亞太經合會與東協加三高峰會、10月則拜訪歐盟英法比等國，締造了韓國政治領域上任以來最高的出訪紀錄（聯合ニュース 2013）。在這一連串全球出訪過程，朴槿惠以中英法語發表演說，與美英法中俄等國領袖會面，也在宣示韓國作為中等強國，在全球政治上將致力於經濟文化科學的推動（中央日報 2013）。

在東亞區域政策的推動上，朴槿惠企圖帶領韓國表現中等強國不同於美國與中國大陸思維的第三條路路線的意圖甚為明顯。朴槿惠東亞區域政策主要的工作重點偏重與中國大陸的經貿關係，將中國大陸視為韓國全球FTA網路建設的核心元素，韓國企圖成為東北亞商務中心的關鍵，並主張中韓FTA的推動將使韓國成為歐美通往中國大陸的重要橋樑。據此，2013年7月起，朴槿惠在完成對美拜訪以後，即開始訪問中國大陸與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會談，除了發表「中韓面向未來聯合聲明」針對中韓關係、朝鮮半島局勢與區域和平發展發表說明以外，同時就進一步發展中韓戰略夥伴關係的未來願景進行協商。在涉及經貿協定部分，「中韓自由貿易區」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簡稱：RCEP）的談判暨合作，成為此次拜訪重點，最後導致中韓自由貿易區在2016年的生效。在安全議題上，朴槿惠政府也同時向中國大陸提出「韓半島信任進程」與「首爾進程」作為

1. 韓國執政黨大國家黨在2012年改名為「新世界黨」，但為了與中文世界溝通，乃將其中文名稱定為「新國家黨」，特此註明以利分辯。

airiti

東北亞安全局勢建構的未來框架（Foster-Carter 2013）。[2]至於在東南亞部分，朴槿惠在10月舉行的亞太經合會前後，積極促進韓國與越南以及澳洲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補足韓國在原有自由貿易網路不足之處（聯合ニュース 2013）。

在跨區域主義的推動上，朴槿惠政府則企圖在對美與對中關係上進行平衡，突顯韓國作為中等強國的重要性。2013年5月5日朴槿惠總統率領史上最大規模的訪美使節團，其中包括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暨51名大企業領袖，以及中小企業、金融界、創投企業，以強化韓美下一代產業合作，但對於美國極力推動的「環太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韓國卻一再抱持保留態度，即使美國貿易代表一再希望韓國加入，韓國仍將中韓自由貿易協定列為優先事項，一直到了7月拜訪中國大陸以後，才在9月勉予同意就環太平洋經濟戰略夥伴協定進行談判（Wow! Korea 2013）。事實上，中日韓三方自由貿易協定的締結，曾被懷疑韓國企圖在沒有美國支持的情形下，「走自己的路」。這種作為在對俄關係上亦可觀察，2013年9月的「20大工業國高峰會」（G20）中，朴槿惠總統就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就俄國在遠東地區及北極航路的合作、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俄羅斯的「新東方計畫」、雙方自由貿易協定，以及韓半島信任進程等議題與普丁總統進行會談。

文在寅總統於2017年上任，其任內將東亞關係列為首要外交目標，先於2017年9月亦於俄羅斯發表了「新北方政策」，主張加強韓國與俄羅斯的遠東地區、中國大陸東三省，以及蒙古三地之間的經濟合作，隨後的2017年11月，文在寅總統在訪問印尼拜訪印尼

2. 「韓半島信任進程」旨在建構韓國與朝鮮之間的互信，而韓朝取得中國大陸的信任，將是信任進程的重要基礎。至於首爾進程旨在推行「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想」，此構想主張韓國、中國大陸和美國等六方會談與會國率先對氣候變化、反恐與核能安全等非政治領域議題開始進行對話，在互信建立以後，再提升對話級別，以實現東北亞的和平與合作。

airiti

總統佐克威以後，除了將雙邊關係提升為「特殊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外交國防2+2會議，將軍工領域作為雙邊戰略合作與互信的重點項目。之後，韓國協助印尼發展潛水艇、第五代戰鬥機（KFX/IFX），浦項鋼鐵集團（POSCO）也與印尼國營鋼鐵合資成立新鋼鐵廠，展現升高雙邊關係的誠意。文在寅總統同時發佈「新南方政策」構想，亦宣稱韓國將把對東協關係，提升到與美、日、中、俄相等的高度。文在寅總統在菲律賓馬尼拉的「東協企業與投資高峰會」（ASEAN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Summit）上，進一步闡述新南方政策的目標，在「以人為本」（people-centered）的原則上共創「和平與繁榮」（Peace and Prosperity）的「韓國—東協共同體」（South Korea-ASEAN Community）。整體而言，新南方政策，被觀察家解讀為韓國藉由《韓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與《東協經濟共同體》進一步擴大韓國在東南亞區域的連結，展現韓國作為中等強國追求國際政治影響力的企圖（陳家齊、朱小明編譯2009）。由新北方政策到新南方政策與，文在寅總統在修正朴槿惠總統時代親中的東亞區域政策，同時也企圖改善與朝鮮關係的僵局，展現出韓國中等強國在國際政治上具有相關自主性的特質。

六、結論

迄今為止，韓國透過自我概念化、外交行動主義與制度性安排，建構了自身的「中等強國」認同，此一外交政策的轉變，亦使韓國由一個偏重對美出口的國家轉為一個偏重區域主義的國家。而在這一個規範在地化的過程中，亦因為強化對於政經危機的回應，透過建立通商交涉本部的組織創造，並在之後透過跨區域主義的推進，將韓國追求中等強國的外交作為制度化。近20年來，東亞各國紛紛強化區域主義的參與，但根據本文的分析，區域國家參與整合之決定，必須透過自身國內政治與國際環境的互動，以建構自身外

airiti

交政策之規範。韓國提出外交方針的自我概念化與政策推動的歷程，對於我們理解亞洲脈絡的中等強國構想，提供了重要的啟示。

特別是文在寅總統於2017年上任以後，踵「新北方政策」之後的「新南方政策」大幅修正了盧武鉉總統時期「先北後南」的平衡者戰略，將東協提升至等同美、日、中、俄等大國的高度，同時就政府組織、安全策略與經濟發展等領域有所作為，展現韓國意識到其中等強國的角色在東亞政治版圖上有所作為的空間。在2018年，文在寅總統除了概念提出與外交行動以外，更透過制度化安排，落實中等強國之概念。在政府的「內部組織」上，韓國於2018年成立了「新南方政策特別委員會」作為統合外交部、產業通商資源部與統一部之決策，強化韓國政府東協政策決策流程。

在「安全策略」上，韓國除了與新加坡的固有關係外，並且選擇性地強化韓國與印尼、越南的戰略關係，並且同時擴大與印度、澳洲與紐西蘭的安全合作，強化自身在亞太安全部局中的地位。2017年文在寅總統將韓國–印尼關係提升為「特殊戰略夥伴關係」，建立外交國防2+2會議，將軍工領域作為雙邊戰略合作與互信的重點項目，協助印尼發展潛水艇、第五代戰鬥機（KFX/IFX）；此外，文在寅總統亦在2018年3月訪問越南之際，與越南國家主席陳大光共同發表聲明，強調雙方將發展戰略合作夥伴關係，並且簽署「東海行為準則」，致力於越南「東海和平倡議」的執行。[3]自此以後，2018年4月越南國防部長吳春歷（Ngô Xuân Lịch）訪問韓國，6月則由韓國國防部長宋永武（Song Young-

3. 東協國家為約束中國大陸於南海的主權聲索作為，因而倡議「南海行為準則」，並於2002年11月由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東協各國於柬埔寨金邊簽署《南海共同行為宣言》（Declaration on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但事實上，各未獲致重要成果。2018年8月的東協–中國大陸外交部長會議中，就「單一磋商文本草案」（Single Draft COC Negotiating Text）獲得共識，標列各國立場，將作為進一步協商依據。其中，越南反對中國大陸在南海的活動，呼籲所有國家停止建造人工島與軍事設施亦予列入。越南國內將越南以東海域稱為「區東」（Biển Đông），意指「東海」，因此與韓簽署聲明亦以東海稱呼。

airiti

Moo）更進一步訪問越南，雙方除了簽署合作備忘錄，聲明就維和武力、防災與人道救援進行合作以外，韓方表達協助越南提升國防工業之意願，將雙方安全合作提升至另一里程碑（The Diplomat 2018）。

在「經濟發展」上，新南方政策也擴大《韓國–東協自由貿易協定》與《東協經濟共同體》的適用，擴大韓國在東南亞的連結，在「以人為本」的原則上，建設「韓國—東協共同體」。在新南方政策公告以後，韓國的貿易投資振興公社公告即強調越南、印尼與菲律賓三國所擁有的豐富人力、天然資源與穩定的政治經濟形勢，將是韓國企業對東南亞投資的主要標的。據此，韓國浦項鋼鐵集團與印尼國營鋼鐵合資成立新鋼鐵廠，樂天、韓泰輪胎、三星、LG、越亞與現代等企業集團，亦紛紛前往越南及印尼擴大投資。而韓國CJ集團與「樂天影業」（Lotte Cinema）更在越南及成立公司，擴大在越南及印尼推廣韓國電影、直接投資當地製作電影、設立電影院、協助越南及印尼電影產業發展，同時亦結合飯店、百貨、超商、餐飲及電影院的大規模聯合開發計畫，奠定韓國娛樂集團在越南及印尼市場之基礎。

在協助東協國家的「連結性」（connectivity）問題上，韓國亦在越南建設捷運、在印尼建築城市鐵路，輸出首爾市捷運系統技術。在能源問題上，韓國則協助越南、印尼、馬來西亞以及菲律賓設立發電站。在水資源管理上，韓國也將與印尼、泰國，寮國及菲律賓進行水資源合作，提供技術與管理模式推動東協國家的水資源利用。在智慧通訊上，韓國將分享其通訊技術，推動東協國家智慧訊息與資訊產業的發展，鋪設通訊網路，應用5G行動通訊技術越南與印尼的數位基礎建設。整體而言，在新南方政策的倡議下，韓國已成熟地將中等強國的相對自主性經由制度性安排，落實到實際作為中，擴大韓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陳家齊、朱小明 2009）。

airiti

由新北方政策到新南方政策與，文在寅總統在修正朴槿惠總統時代親中的東亞區域政策，同時也企圖改善與朝鮮關係的僵局，展現出韓國中等強國在國際政治上具有相關自主性的特質。首先，現行對於中等強國的研究中，多數仍著重歐美脈絡，鮮少對於亞洲國家的中等強國構想進行研究。本文剖析韓國追求「中等國家」的政策作為與制度性安排，不但發現東亞區域的互動，除了存在東協主導的多邊制度環境以外，韓國自身「中等強國」的構想對於東亞共同體，乃至於個別東亞國家在全球政治的發展，都有一定的啟示意義。韓國的案例顯示，藉由國家自身的行動主義，區域國家具有增強自身外交影響力的可能。韓國在金大中與盧武鉉兩任總統任內開啟韓國推進自由貿易協定的轉向，使得韓國由一個國際自由貿易的後進者，一躍成為領先者。韓國至今已經美國、歐盟及東協簽署自由貿易協定，已成為全球貿易領域最具競爭力的國家之一。而韓國能否進一步克服領土與歷史問題，推動與中日兩國的自由貿易協定，顯然也需要進一步瞭解區域主義是否在東亞區域國家取得正當性，而此一過程與規範在地化的進程具有密切關係。

其次、在貿易政治的研究上，韓國參與區域主義之政策路徑亦具有啟發意義。一般研究多半認為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將弱化政府干預經濟的能力，但在韓國的案例中，國家不但主動經由區域主義的建構，透過與歐美市場接軌的方式，強化國內的經濟結構，此證明了即使在全球化時代，國家並不必然會失去作為的能力，透過規範在地化的塑造，國家之作為不但可以影響國家參與區域整合之決策，更足以推動國內經濟形態的改變。韓國利用兩次全球金融危機來加速韓國在全球經濟場域的參與，甚至使自由貿易協定網路成為韓國突破全球經濟成長遲滯限制之重要基礎。

第三、在地緣政治的研究上，韓國「中等強國」概念的發展，亦有顯著的限制。韓國中等強國構想的追求，與總統的政治意

airiti

志相關，而在缺乏美國支持下，地緣政治仍是韓國追求中等強國角色決策思考的核心要素。其中，來自北韓的安全威脅，仍是韓國對外關係的核心議題。因此，在歷任總統所提出的韓國區域方案，主要目標，仍在解消日益升高的安全顧慮，此一區域方案乃鑲嵌於地緣政治與區域經濟動態，並且足以影響未來韓國發展的遠景（Choi 2009, 49）。而在此一思唯下，韓國對於東北亞的看重，仍然高於東南亞影響力。譬如最早提出中等強國論的盧泰愚總統，在他1991年提出此一構想的主要用意，在於利用1988年夏季奧運的舉辦以後的機會解消北韓的威脅，積極與俄中以及其他亞洲的社會主義國家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以強化韓國的國際地位。而透過其與俄中兩大強權的關係來改善朝鮮半島南北關係，亦是中等強國論的核心關懷之一。

最後、傳統的中等強國研究，主張中等強國與霸權的關係，將中等強國構想的成敗。過往東亞國際政治的研究上，雖曾有日本與中國大陸的相繼崛起，在外交作為上提出自身之主張，然而韓國無論在經濟規模與政治實力上，均難以和日本、中國大陸相提並論，因此韓國的中等強國構想在沒有明顯取得美國或中國大陸的支持之下，仍能取得一定成功，在亞洲的脈絡中，具有象徵性意義。而韓國透過中等強國論述建構其與東協之間的關係發展，對於韓國中等強國的相關自主路線，將具指標性意義。主因在在透過韓國豐厚的經濟實力（邱達生 2017；賴怡忠 2006），以發展援助與經貿交流的方式深化雙邊關係，而東協晚近發展迅速，雙邊又互為戰略夥伴（Easley and Park 2017; 陳建宏、阮紅絨、黃祥穎、鄒建中 2012; 聯合報 2017; 鍾詠翔編譯 2018），韓國與東協是否能夠強化彼此合作，共創亞洲中等強國自主發展路線，將是未來東亞政治的關注焦點。

airiti

參考文獻

一、中文

吳玲君，2012，〈中國推動東北亞自由貿易區策略：機會與意願的研究途徑〉，《遠景基金會季刊》，13（2）：143-181。Wu, Lin-jun. 2012. “Zhongguo tuidong dongbeiya ziyou maoyi qu celue” [China’s Construction of Strategic Path to Northeast Asia Free Trade Area: The Approach of Opportunity and Willingness]. *Taipei: Prospect Quarterly* 13 (2): 143-181.

吳玲君，2007，〈東協國家與東亞經濟合作：從「東協加三」到「東亞高峰會」〉，《問題與研究》，46（2）：117-139。Wu, Lin-jun. 2007. “Dongxie guojia yu dongya jingji hezuo: cong ‘dongxie jiasan’ dao ‘dongya gaofenghui’” [ASEAN and the East Asia Economic Integration: From “ASEAN Plus Three” to “East Asia Summit”]. *Taipei: Wenti Yu Yanjiu* 46 (2): 117-139.

宋興洲，2005，〈「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合作〉，《政治科學論叢》，24：1-48。Sung, Hsing-chou. 2005. “‘Quyu zhuyi’ yu dongya jingji hezuo” [Regionalism and East Asian Economic Cooperation]. *Taipei: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1-48.

李佩珊、楊昊，2007，〈建構《東協憲章》：是作繭自縛？還是老調重彈？〉，《政治學報》，43：123-173。Lee, Pei-Shan, and Hao Yang. 2007. “Jiangou dongxie xianzhang: Shi zuojianzifu? Haishi laodiaochongtan?” [Constructing the ASEAN Charter: As Self-restraint or Self-indulgent?]. *Taiwa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3: 123-173.

李明，2013，〈朴槿惠勝選與未來週邊安全〉，《全球政治評論》，41：1-6。Lee, Ming. 2013. “Park Geun-hye shengxuan yu weilai zhoubian anquan” [Park Geun-Hye’s Victory and Regional Security]. *Taiwan: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41: 1-6.

邱達生，2017，〈專家傳真－韓國推動新南方政策對我之意涵〉，《工商時報》，12月14日。Chiu, Darson. 2017. “Zhuanjia chuanzhen—hanguo tuidong xinnanfang zhengce dui wo zhi yihan” [Message from the Experts: What South Korea’s New Southern Policy to Means to Us]. *Chinatimes* (December 14).

楊昊，2010，〈同舟如何共濟？東協區域災難合作的集體行動邏輯〉，《台灣東南亞學刊》，7（2）：21-62。Hao Yang. 2010. “Tungjou Ruhe Gungji? Dungshie Chiuyu Tzainan Hetzuo De Jiti Shingdung Luoji” [How to Cope with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s? The Logic of Collection Action in ASEAN Regional Disaster Cooperation]. *Nantou: Taiw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iriti

Asian Studies 7 (2): 21-63.

劉德海，2011，〈進入21世紀以來的南韓與東協經貿關係〉，《台灣國際研究季刊》，7（1）：147-169。Liou, To-hai. 2011. “Jinru 21 shiji yilai de nanhan yu dongxie jingji maoyi guanxi” [South Korea-ASE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Taiwan: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7 (1): 147-169.

廖舜右，2011，〈亞太主義與東亞主義對峙下的東協加八〉，《政治學報》，29-51。Liao, Shun-yo. 2011. “Yatai zhuyi yu dongya zhuyi duizhi xia de dongxie jiaba” [Confrontation Between Asia-Pacificism and East Asianism: ASEAN + 8]. *Taiwa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1: 29-51.

聯合報，2017，〈南韓東協已成為第2大貿易夥伴〉，《聯合報》，6月1日。United Daily News. 2017. “Nanhan dongxie yi chengwei dierda maoyi huoban” [South Korea and ASEAN have become second biggest trading partners]. *United Daily News* (June 1).

蕭全政，2001，〈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14：201-222。Shiau, Chyuan-jenq. 2001. “Dongya ‘quyu zhuyi’ de fazhan yu taiwan de jiaos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the Role of Taiwan]. *Taipei: Taiw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4: 201-222.

賴怡忠，2006，〈變動的亞洲-台灣觀點〉，《台灣國際研究季刊》，213-224。Lai, I-chung. 2006. “Biandong de yazhou-taiwan guandian” [Changing Asia: A Taiwan Perspective]. *Taiwan: Taiw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14: 201-222.

鍾詠翔編譯，2018，〈不想受美中制約：南韓擴大布局越南〉，《聯合報》，4月4日。Zhong, Yong-xiang. 2018. “Buxiang sho meizhong zhiyue: nanhan kuoda buju yuenan” [Not wanting to be constrained by the US and China: South Korea expands its arrangements in Vietnam]. *United Daily News* (April 4).

陳家齊、朱小明編譯，2009，〈南韓東協簽自貿協定：雙方貿易規模 2015 年增至1,500億美元〉，《經濟日報》，6月3日。Chen, Chia-chi and Chu, Hsiao-ming. 2009. “Nanhan dongxie qian zimao xieding: shuangfang maoyi guimuo 2015 nian zengzhi 1500 yi meiyuan” [South Korea signs Free Trade Agreement with ASEAN: The scale of trade between the two sides to increase to US$150 billion in 2015]. *Economic Daily* (June 3).

陳建宏、阮紅絨、黃祥穎、鄒建中，2012，〈越南與亞洲四小龍主要產業之出口競爭力分析〉，《財金論文叢刊》，60-73。Chen, Chien-hung, Hong-nhung Nguyen, Hsiang-ying Huang, Jiann-Jong Chou 2012. “Yuenan yu yazhou sixiaolong zhuyao chanye chukou jingzhengli yu fenxi” [A Study of Export Competitiveness in Viet Nam and NIEs]. *Taiwan: Journal of Financial Review* 60-73.

airiti

二、外文

Acharya, A. 2004.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n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8 (2): 239-275.

Acharya, A. 1997, "Ideas, Identity,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From the 'Asean Way' to the 'Asia-Pacific Way'?" *The Pacific Review* 10 (3): 319-346.

Aggarwal, V. K. and M. G. Koo, M. G. 2007.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7 (3): 360-369.

Aggarwal, V. K., M. G. Koo, and S. Lee. 2009, "The Future of Northeast Asia's Institutional Architecture" in V. K. Aggarwal, M. G. Koo, S. Lee and C.-i. Moon (eds). *Northeast Asia: Ripe for Integra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245-261.

Ashizawa, K. P. 2004. "Japa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ultilateral Institutional Institution-Building in the Asia-Pacific: APEC and the ARF" in E. S. Krauss and T. J. Pempel (eds).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Stanford, C.A.: Standord University Press. 248-271.

Beeson, M. 2011. "Crisis Dynamics and Regionalism: East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cific Review* 24 (3): 357-374.

Billiet, J., B. Maddens, and A. Frognier. 2006. "Does Belgium (Still) Exist?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Culture between Flemings and Walloon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29 (5): 912-932.

Bollens, S. A. 2008. "The City, Substate Nationalism, and European Governance"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14 (2): 189-222.

Calder, K. E. 2008. "Critical Junctures and the Contours of Northeast Asian Regionalism" in K. E. Calder and F. Fukuyama (eds). *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5-39.

Calder, K. E. and M. Ye. 2010. *The Making of Northeast As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Capling, A. and K. R. Nossal. 2009.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gionalism in North Americ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147-167.

Caporaso, J. A. and S. Tarrow. 2009. "Polanyi in Brussels: Supra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the Transnational Embedding of Marke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 (4): 593-620.

airiti

Chang, H. 2000. "The Hazard of Moral Hazard: Untangling the Asian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28 (4): 775-788.

Chang, H. 1994.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Cherry, J. 2012. "Upgrading the 'Software': The EU-Korea Free Trade Agreement and Sociocultural Barriers to Trade and Investment" *The Pacific Review* 25 (2): 247-268.

Cho, Y. 2009. "Forging Stronger Partnership for ASEAN, Korea." *Review of THE KOREA HERALD*. June 2.

Choi, Y. J. 2009. "South Korea's Regional Strategy and Middle Power Activism," *The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23: 47-67.

Chwieroth, J. M. 2007.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Emerging Marke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1 (2): 443-463.

Coenen, L. and B. T. Asheim. 2006.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Cooke, P. 2006. "Regional Asymmetries, Knowledge Catagories and Innovation Intermediation" in P. Cooke and A. Piccaluga (eds).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21.

Cooper, A. F., R. A. Higgot, and K. R. Nossal. 1993. *Relocating Middle Powers: Australia and Canada in a Changing World Order*. Vancouver: UBC Press.

Cossa, R. A., and J. Khanna. 1997. "East Asia: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73: 2, 219-234.

Deutsch, K. W. 1953.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n Inquiry into the Foundations of Nationality*. New York: M.I.T.

Dieter, H. 2009. "Changing Patterns of Regional Governance: From Security to Political Economy?" *The Pacific Review* 22 (1): 73-90.

Dore, R. 1998. "Asian Crisis and the Future of the Japanese Model"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2 (6): 773-787.

Easley, L., and K. Park. 2017. "South Korea's Mismatched Diplomacy in Asia: Middle Power Identity, Interests, and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55 (2): 242-263.

Foster-Carter, Aidan. 2013 "South Korea's Park Geun-hye Finds a Middle Way," *the Telegraph* (Accessed on May 25, 2018).

airiti

Gilson, J. 2004. "Complex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Strategising' Japan's Responses to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17 (1): 71-94.

Glazebrook, G. d. 1947. "The Middle Powers in the United Nations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1 (2): 307-315.

Grimes, W. W. 2011: "The Future of Regional Liquidity Arrangements in East Asia: Lessons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24 (3): 291-310.

Grimes, W. W. 2006. "Japan as the 'Indispensable' Nation in Asia: A Financial Brand for the 21st Century" *Asia-Pacific Review* 12 (1): 40-54.

Haggard, S., W. Lim, and E. Kim (eds). 2003. *Economic Crisis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Korea: Reforming the Chaeb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ggard, S., W. Lim, and E. Kim (eds). 2003. *Economic Crisis and Corporate Restructuring in Korea: Reforming the Chaebo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all, P. A., and D. Soskice. (eds). 2001. *Varieties of Capitalism: 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atch, W. 2002. "Regionalizing the State: Japanese Administrative and Financial Guidance for Asia"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5 (2): 179-197.

Helleiner, E., and S. Pagliari. 2011. "The End of an Era i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egulation? A Postcrisis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5 (1): 169-200.

Hemmer, C. M., and P. J. Katzenstein. 2002. "Why Is There No NATO in Asia? Collective Identity, Region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3): 575-608.

Hong, S. G. 199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 Policy in East Asia: 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Ikenberry, G. J. 2008. "A New Order in East Asia?" in K. E. Calder and F. Fukuyama (eds). *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17-232.

Jones, D. M., and M. L. R. Smith. 2007. "Constructing Communities: The Curious Case of East Asian Region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3: 165-186.

Kang, D. C. 2002. "Bad Loans to Good Friends: Money Politics and the

airiti

Developmental State in South Korea"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1): 117-207.

Kang, D. C. 2009. "Between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South Korea's Response to China"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9 (1): 1-28.

Kang, D. C. 2002. *Crony Capitalism: Corruption and Development in South Korea and the Philipp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tada, S. N. 2011. "Seeking a Place for East Asian Regionalism: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und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24 (3): 273-290.

Katzenstein, P. J. 2000. *Asian Regionalism*. Ithaca. N.Y.: East Asia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Katzenstein, P. J. 1978. *Between Power and Plenty: Foreign Economic Policies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tate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Katzenstein, P. J. 2003. "Regional States: Japan and Asia, Germany in Europe" in K. Yamamura, and Streeck W. (eds). *The Trend of Diversity: Prospects for German and Japanese Capitalism*. Ith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 J. 1985. *Small States in World Market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atzenstein, P. J. 2005. *A World of Regions: Asia and Europe in the American Imperiu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auss, E. S. 2003. "The US, Japa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From Bilateralism to Regional Multilateralism to Regionalism." *The Pacific Review* 16 (3): 307-329.

Lake, D. A. 2009. "Regional Hierarchy: Authority and Local Internation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 35-58.

Le Galès, P. 2002. *European Cities: Social Conflicts and Govern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ee, S., and C. Moon. 2009. "South Korea's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an Adaptive Strategy" in V. K. Aggarwal, M. G. Koo, S. Lee and C.-i. Moon (eds). *Northeast Asia: Ripe for Integration?*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MacIntyre, A., T. J. Pempel and J. Ravenhill. 2008. "East Asia in the Wake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A. MacIntyre, T. J. Pempel and J. Ravenhill (eds). *Crisis as Catalyst: Asia's Dynamic Political Econom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airiti

MacLeod, G. 2001. "New Regionalism Reconsidered: Globa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Political Economic Spa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5 (4): 804-829.

Nesadurai, H. E. S. 2009. "ASE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after the Cold War: From Regional Order to Regional Community" *The Pacific Review* 22 (1): 91-118.

Paasi, A. 2009. "The Resurgence of the 'Region' and 'Regional Ident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and Empirical Observations on Regional Dynamics in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 121-146.

Panitch, L., and M. Konings. 2009. "Myths of Neoliberal Deregulation" *New Left Reivew* 57: 67-83.

Paquin, S. 2002. "Globalization,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Rise of Neo-Nationalism in Scotland" *Natio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8 (1): 55-80.

Park, S.-H., and M. G. Koo. 2007. "Forming a Cross-Regional Partnership: The South Korea-Chile FTA and Its Implications" *Pacific Affairs* 80 (2): 259-278.

Ramstad, E., and S. Y. Lee. 2011. "Korea's Lee Pushes Overhaul." Review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Edition)* (Jun 28).

Prashanth Parameswaran, "What's in the New Vietnam-South Korea Defense Pact?" *The Diplomat*, [https://thediplomat.com/2018/06/whats-in-the-new-vietnam-south-korea-defense-pact/]. (Accessed on Nov 12, 2018.)

Ravenhill, J. 2000. "APEC Adrift: Implications for Economic Regionalism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Pacific Review* 13 (2): 319-333.

Ravenhill, J. 2009. "East Asian Regionalism: Much Ado about Noth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5 (S): 215-235.

Rhyu, S.-y. 2011. "South Korea's Political Dynamics of Regional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Korea-Japan FTA and Korea-U.S. FTA." in V. K. Aggarwal and S. Lee (eds). *Trade Policy in the Asia-Pacific: The Role of Ideas, Interests, and Domestic Institutions*.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Rhyu, S.-y., and S. Lee. 2006. "Changing Dynamics in Korea-Japan Economic Relations: Policy Idea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sian Survey* 46 (2): 195-214.

Robertson, J. 2012. "South Korean FTA Negotiations: Patterns of Negotiation Outside a South Korea Cultural Context?" *Asian Survey* 52 (3): 465-483.

Schmiegelow, M. and H. Schmiegelow. 2007. "The Road to an Asi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e Politik Global Edition* 8 (4): 10-17.

airiti

Schmitter, P. C. 1981: “Interest Intermediation and Regime Governability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in S. D. Berger (ed). *Organizing Interests in We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kiguchi, T. 2012. “World News: Japan: Japan Agrees to Symbolic Deal with China, Korea.” Review of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sia Edition)* .

Shin, S.-o. 2015. South Korea’s Elusive Middlepowermanship: Regional or Global Player?” *The Pacific Review* 29 (2): 187-209.

Solís, M. and S. N. Katada. 2009. “Explaining FTA Proliferation: A Policy Diffusion Framework” in M. Solís, B. Stallings and S. N. Katada (eds). *Competitive Regionalism: FTA Diffusion in the Pacific Ri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Solís, M. and S. N. Katada. 2007. “The Japan-Mexico FTA: A Cross-Regional Step in the Path towards Asian Regionalism” *Pacific Affairs* 80 (2): 279-301.

Wade, R. and F. Veneroso. 1998. “The Asian Crisis: The High Debt Model versus the Wall Street-Treasury-IMF Complex” *New Left Review*. I/228: 3-22.

Weiss, L. 2003. “Is the State Being 'Transformed' by Globalisation?” in L. Weiss (ed).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Bringing Domestic Institutions Back In*.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ss, L. 1998. *The Myth of the Powerless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oo, M. J.-E. 2007. “The New East Asia” *New Left Review* 47: 57-69.

Woo-Cumings, M. 1999. “The State, Democracy and Reform of the Corporate Sector in Korea in T. J. Pempel (ed). *The Politics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ow! Korea. 2013. “TPP交渉「韓国の参加は当然」＝米通商副代表.” http://www.wowkorea.jp/news/korea/2013/0313/10109995.html. (Accessed on July 17, 2018).

中央日報. 2013. “ＥＵの5大企業、韓国に4000億ウォン規模の投資合意.” http://japanese.joins.com/article/055/178055.html. (Accessed on July 7, 2018).

聯合ニュース. 2013. “朴大統領 あすから西欧歴訪＝パートナー関係構築模索.” http://japanese.yonhapnews.co.kr/headline/2013/11/01/0200000000AJP20131101002100882.HTML. (Accessed on June 25, 2018).

聯合ニュース. 2013. “韓国・ベトナム首脳会談 来年中のFTA締結目指す.”

airiti

http://japanese.yonhapnews.co.kr/Politics2/2013/09/09/0900000000AJP20130909002800882.HTML. (Accessed on June 17, 2018).

聯絡作者：王文岳
聯絡地址：南投縣埔里鎮桃米里大學路一號東南亞學系
電子信箱：jameswang@ncnu.edu.tw
收稿日期：2018/05/17
審稿通過：2018/10/03
責任編輯：高士元、鄧峻丞、宋淳暄、何育墉